

40年国是反思丛书

大跃进狂澜

● 谢春涛

● 河南人民出版社



40年国是反思丛书

大跃进狂澜

- 谢春涛
- 河南人民出版社

40年国是反思丛书
大跃进狂澜

谢春涛

责任编辑 汪 琼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荥阳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325印张 208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8,000—21,070册

ISBN7-215-00709-x/Z·30

定价 3.90元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经40年了。

40年前，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40年来，我们不仅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不仅在生产关系方面实现了根本转变，而且在生产力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在各方面获得的伟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但是，历史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笔直的。40年来，我们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也有积重难返的岁月，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遭受过令人痛心的严重挫折。中国40年历史舞台上急剧而令人眩目的变化，为整个人类历史所少见。这是一份值得认真总结和继承的非常难得的宝贵财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的高度，认真反思40年的历史，充分发掘这一宝贵财富的效能，必将对我

国现代化进程作出有益的贡献。《40年国是反思丛书》即为此而尽力。

本丛书将着意展现共和国40年历史的真实面貌。承认某些历史事实是痛苦的。但唯其痛苦，才能使我们民族久已麻痹的那部分神经不再麻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会牵扯到众多的死人和活人，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在于判明某些人的英明和某些人的愚蠢，或者某些人的高尚和某些人的卑鄙，而着眼于我们所应汲取的历史经验教训。

本丛书对新中国历史的反思是从今天的现实出发的。在古老的罗马神话中，门神雅努斯的脑袋前后各有一副面孔，可以同时看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面明察过去以汲取历史教训；一面展望未来予人以美好的憧憬。唯独无暇顾及最有意义的现在。结果，雅努斯未能庇护一度强大昌盛的罗马帝国，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丛书立足于今天，反思既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从揭示历史的真谛中探寻今天改革的道路和通向理想未来的途径。

当我们反思40年历史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带着沉痛的心情审视那些“荒唐岁月”或“荒唐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耳畔经常响起中外哲人的“箴言”：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

“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正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会经

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恩格斯)

由此，我们不敢以轻率的态度而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我们不敢以戏谑的态度而以郑重的态度对待人们的历史过错。我们对一切创造历史而非戏弄历史的人们抱有深深的敬意。我们的丛书是献给一切在新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过或正在扮演正剧或悲剧的角色的人们的。

《40年国是反思丛书》编委会

小 引

“大跃进”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共中央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带全局性失误的经济建设运动。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中共中央对“大跃进”运动的评价,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大跃进”运动期间。中共中央作出了完全肯定的评价。认为“大跃进”是符合我国实际的伟大创举,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正确战略。“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和开展,必将迅速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使我国经济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阶段,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面对“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等严重问题,中共中央在基本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较多地承认了其缺点和错误,作出了缺点和成绩三七开的基本评价。认为工农业生产指标定得太高,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不切实际地下放了管理权限,急速膨胀了城镇人口,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了经济建设的重大损失。这一评价,是刘少奇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作出的。

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对“大跃进”运动再次作出了完全肯定的评价。认为，在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大跃进”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刘少奇对“大跃进”的评价，则是他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部分。直到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仍然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现工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全面“跃进”。

第四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以后。在此阶段，中共中央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大跃进”作出了基本否定的正确评价。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58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进一步作出了如下评价：“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

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学术界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的。从1980年至今，陆续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对“大跃进”运动以及与之有关的批反冒进、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大跃进”运动是在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发动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产物，“大跃进”运动应当分为三段（1958年的大炼钢铁，1959年的“反右倾”和“继续跃进”以及1960年的“更大跃进”），“大跃进”运动应从指导思想上加以否定等。近几年出版的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著作，也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较多的论述，在“大跃进”的运动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

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开始较晚、资料缺乏等各种原因，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至今，国内没有一本专门的研究著作，也没有一部单独的资料汇集。有关的专题论文虽然发表了一些，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有些文章的观点并不深刻，有些问题也没有论及。在个别问题上，还存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如认为对“大跃进”运动也应一分为二，肯定其成绩等。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大跃进”运动的某些错误也还远没有绝迹。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繁荣学术

事业，有必要对“大跃进”运动进行认真细致、深入全面的研究。

本人就是鉴于上述情况，决定研究“大跃进”运动的。力求对“大跃进”运动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弄清“大跃进”运动的背景、“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大跃进”运动的高潮以及对其错误的最初纠正、纠错过程的中断、错误的继续发展、“大跃进”运动的最后终止等问题，并对“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初步的总结。

对于“大跃进”运动期间开展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它和“大跃进”运动同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产物，其发动者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以改变生产关系的方式来推动农业生产的“跃进”，因而，也在本书中进行了论述。

目 录

前言	(1)
小引	(1)
一 从反冒进说起	(1)
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	(1)
1956年的急躁冒进	(3)
反冒进的各项措施	(6)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歧	(10)
二 “大跃进”的开始发动	(15)
“必须恢复促进委员会”	(15)
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	(22)
不能“象蜗牛一样爬行”	(26)
修改提高计划指标	(28)
三 上半年的不断升温	(30)
“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	(30)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33)
反浪费、反保守运动	(34)
1958年的第二本帐	(38)
四 “一次大跃进的会议”	(46)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47)

0218/24

	“一天等于二十年”	(49)
	“拔白旗”，“插红旗”	(50)
	破除迷信和旧的规章制度	(51)
五	“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56)
	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56)
	竞相发射“高产卫星”	(59)
	教育、文艺不甘落后	(68)
	从大社到人民公社	(70)
六	北戴河海滨的热浪	(73)
	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	(74)
	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	(75)
	决定建立人民公社	(78)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80)
七	全民大炼钢铁	(85)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85)
	第一书记挂帅	(86)
	九千万人上阵	(90)
	全民大炼的结果	(93)
八	人民公社化运动	(98)
	合作社向人民公社的急速转变	(98)
	政社合一及其他	(101)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06)
	“新村”与乌托邦	(111)
九	碰壁之后的思考	(115)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	(115)
整顿人民公社·····	(122)
“不能每天高潮”·····	(128)
在经济困难面前·····	(135)
十 庐山上的政治气候 ·····	(143)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143)
彭德怀的“意见书”·····	(151)
对“右倾反党集团”的处置·····	(161)
风云突变的原因及后果·····	(166)
十一 领袖的意气用事 ·····	(172)
庐山上的指标调整·····	(172)
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	(174)
1960年上半年的“更大跃进”·····	(185)
“共产风”的再度刮起·····	(196)
十二 “跃进”战车的被迫停驶 ·····	(201)
严重的经济困难·····	(201)
各项应急措施·····	(205)
逐渐清醒的认识·····	(211)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确定·····	(213)
十三 “跃进”后的五年调整 ·····	(219)
调整工作的全面展开·····	(219)
七千人大会与西楼会议·····	(234)
伤筋动骨的调整措施·····	(237)
“跃进”前水平的恢复·····	(246)

十四 三十年后的思考	(255)
沉重的灾难.....	(255)
主观唯意志论和经验主义的结合.....	(257)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260)
出路在于政治民主.....	(262)
附录：“大跃进”运动大事记	(266)
后记	(327)

一 从反冒进说起

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

1955年7月和10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党的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毛泽东对邓子恢等人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之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进展和接近完成，他又对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以及经济建设等方面存在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不断的批判。

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第二篇序言中指出，农业集体化运动迅速进展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①现在，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而是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批判和克服“确实存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3页

的右倾保守思想”，以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

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应该促进事业的发展，采取后一种领导方法。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向全国人民传达了党中央发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号召。社论指出：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而且可以办的事情。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

在1955年底和1956年初的一段时间内，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几乎成了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必不可少的议题，许多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对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广泛的批判。更为严重的是，党中央还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①

这样，党的领导人已经基本形成了这样一种指导思想：

①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页。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此形势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而且也完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地发展。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对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促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同样，对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也必然会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极为迅速的发展。因此，必须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当作全党的重要任务，以此来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思想，表明了党的领导人在领导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之后，对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充分自信，表明了在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到来之际，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

1956年的急躁冒进

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必然会导致实践上的急躁冒进。从1955年底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高计划指标，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现象。

1955年11月，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17条意见。随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以农业17条为基础，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一文件的中心任务是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规模